

优化空间布局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肖金成 李博雅 邢干

京津冀空间布局的优化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提出要构建“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空间格局。从纲要公布的空间布局图来看,“一核”指的是北京,“双城”指的是天津和石家庄,“三轴”指的是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个发展轴,“四区”分别是中部核心功能区、东部滨海发展区、南部功能拓展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多节点”包括唐山、保定、邯郸、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等节点城市。着眼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效与问题,应重视优化京津冀空间布局,提升京津双城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三大发展轴,促进三大都市圈耦合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发展战略性功能区,推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形成优势突出、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新格局。

打造三大发展轴。发展轴是依托重要的现状基础设施束(交通干线、能源输送线、水源及通信干线等)连接若干个城市而形成的人口、产业、城镇、经济要素相对密集的带状区域。依托沿线城市进一步聚集产业和人口,通过“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开发战略引导和影响区域的发展。京津塘、沿海、京石邯三大发展轴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体框架。

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京津冀地区包含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已形成北京都市圈和天津都市圈,两个都市圈的边界相互耦合。石家庄属于I型大城市,石家庄都市圈也已形成,与北京都市圈、天津都市圈形成互动关系。未来京津冀应以“三城”带动“三圈”,“三圈”支撑“一群”,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所谓经济增长极是指在空间范围不太大的地方,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实施高效管理,并辅之以优惠政策,快速聚集经济要素,起到对一个区域的支撑作用。京津冀未来的增长动力来自新的经济增长极。建议加快建设雄安新区,加快发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发展张家口旅游休闲产业。

发展战略性功能区。产业转移与承接是京津冀协同的重点任务。应

空间布局优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任务。作为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已实施了八年,区域协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地区之间的合作意识不断加强,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产业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等重点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京津冀三地发展差距较大、产业链融合不足、城镇体系不合理、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强等问题仍较突出。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民生改善的领域,推动发展战略性功能区,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自主研发能力,通过人才、资金、知识等要素的空间溢出与成果转化,形成分工明确、交流合作、结构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建议加快将中关村建成世界领先的科技园区,加快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服务中心,继续支持天津滨海新区加快发展,加快推动河北主要

新区建设发展。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应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进一步提升北京的辐射带动能力,强化国际交往功能和科技创新功能;天津应重点聚焦与现代制造业相关的科技研发、航运业、金融业等领域,带动京津冀区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创新发展;河北应积极承接京津两市外迁转移的一般性制造业,提升各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缩小河北各市与京津的发展差距,促进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形成功能明确、分工合理、合作互动的集约化空间发展格局,实现高标准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早日跻身于世界级城市群。

促进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的对策

推进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将是各因素相互作用的长期过程。应以三大都市圈为着力点推动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积极发挥规划先导和政策引导的作用,建立区域统一要素市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构筑区域交通网络格局,加快推进京津冀产业联合与合作。

以三大都市为责任主体,推动三大都市圈规划建设发展。以“三城”引领“三圈”,更好地发挥都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是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路

径。都市同时具有吸引力和辐射力,但由于行政区的分割,往往会抑制辐射作用的发挥,通过对都市圈进行规划,有利于消除行政分割,提高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都市圈规划建设管理应实行“责任制”,以都市为责任主体,应根据都市的辐射半径确定各自的辐射范围,建立都市圈合作机制。参照其他地区的经验与模式,建议建立都市圈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和合作发展基金。第一步是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规划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编制现代化都市圈规划;第二步是根据规划进行交通网络建设,消除断头路,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第三步是构筑整个都市圈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第四步是促进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支持中小城市补短板、强弱项,完善县城、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发展特色小镇;第五步是促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立统一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京津冀区域需统一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并由此保障资源配置的区域化。应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一是要统一人才市场,构筑人才信息平台,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灵活就业、城乡和行业一体化的劳动力要素市场;二是要构建统一资本市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北京金融资源和津冀新区的政策资源优势,构建不同辐射范围的金融中心,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研究如何发挥资本市场在产业一体化及产业升级中的作用;三是要统一技术要素市场,明确京津冀三地不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通过构建科技成果激励机制,提升京津冀各地区创新成果转化和创新

服务能力,为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一方面,河北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发展低碳产业、特色产业,促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实现人口数量、经济活动和用地相互匹配,城市规模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另一方面,应依托现有产业基础,选择一些具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地区共建一批京津冀产业合作平台,促进产业要素高效流动,围绕特色产业链形成分工合理的空间布局。将北戴河新区、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冀南新区、正定新区等作为河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着力点,将其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选择一到两家提升为国家级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全面缩小河北与京津的发展差距。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网络体系应当成为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的突破口。京津冀三地应整合城际公路交通和城市道路交通,积极推进大运量的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建设,构筑网络化的交通体系,为核心城市有机疏解和优化空间布局创造条件。一是在减轻北京中心城区城市道路交通压力的同时,进一步改善京津冀城际之间的交通联系,打破行政区划的阻隔,提升区域交通网络的便捷程度。二是以加强沿海经济带交通联系为目标,形成纵贯南北的综合交通体系,扩大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三是加强航空港、海港之间以及陆港和海港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完善的航空港、陆港、海港综合交通体系。

建立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一是应加快改革创新步伐,破解行政壁垒和制度障碍。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到促进环渤海区域合作继而构建东北亚国际次区域合作,应制定一系列改革创新和区域合作政策。二是建立与行政区适度分开的经济区高层次协调机构,主要负责区域规划的编制、重大利益的协调、统筹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战略决策与政策制定。三是建立三地利益共享机制,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工程建设与产业布局调整等方面寻找各方互惠互利的合作切入点。

(作者单位:肖金成,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李博雅,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邢干,北京物资学院法学院)

(稿件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刘军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数字中国、贸易强国。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是我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数字贸易是指基于信息通信技术,通过信息通信网络开展货物、服务和数字化产品交易的商业活动。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贸易成为一国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新引擎。我国要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并引领世界经济共同发展,必须加快发展数字贸易。

首先,发展数字贸易是我国顺应数字化时代国际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数字贸易是数字化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只有顺应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把握国际发展的历史大势,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我国正确把握历史发展方向,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和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迅速普及,我国只有加快推进传统贸易转型升级,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才能在国际贸易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促进我国和世界经济不断发展。

其次,发展数字贸易是我国提升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的内在要求。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为抢占数字贸易发展制高点,掌握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积极制定并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推动传统贸易数字化转型升级。以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数字贸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数字贸易作为新型贸易形式突破了传统贸易的规则框架,全球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尚待建立。发达经济体基于自身的数字贸易发展状况和利益诉求,积极推进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建构,从而对全球数字贸易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世界贸易大国,我国要保持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提升在全球数字贸易领域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必须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不断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

最后,发展数字贸易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引领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被社会主义完全取代的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以价值增殖为根本追求,资本主义数字贸易必然带来各国及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从而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有责任和义务引领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消弭数字鸿沟。这需要我国加速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增强数字经济的可及性。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的,“我们应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经济可及性,消弭数字鸿沟,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我们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提供有利的技术支撑、政策支持和人才保证,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

其一,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提供有利的技术支撑。我国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发展迅速,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华为等一批技术型创新企业名列世界前茅。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网络等前沿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有力推动了数字贸易的发展。但是,与美国、日本、英国等数字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仍面临巨大挑战。其中,在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底层技术上面临“卡脖子”问题,如高端芯片、高端存储设备、开发平台等存在明显短板,高端芯片和制造装备等严重依赖进口、受制于人。因此,我国要在数字技术及其基础性理论研究和投入方面下大功夫,包括对作为人工智能发展基石的数学学科的研究和投入,提高数字经济核心技术水平,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提供技术支撑。

其二,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持。近年来,我国出台了許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数字贸易得到了国家及各省市相关政策的大力扶持。但是,从数字贸易的全领域来看,我国尚未形成系统性数字贸易政策体系。根据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处于跨越期的实际情况,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数字贸易发展经验,我国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健全数字贸易政策体系。一是深化和细化数字贸易发展战略,把数字贸易列入经济发展长远规划;二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拓展数字贸易发展空间;三是营造良好的数字贸易发展环境,建立数字贸易产业税收政策体系;四是完善数字贸易法律体系和数字贸易治理机制。

其三,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提供有利的人才保证。数字贸易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人才的竞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我国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我国实现数字贸易跨越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关键在于数字贸易人才。因此,必须加快培育和引进创新型、复合型数字贸易人才,激发人才活力。包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数字贸易知识教育与数字贸易技能培训有机融合,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高效衔接;建立数字贸易人才激励机制,创新数字贸易人才评价机制,营造尊重数字贸易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对数字贸易人员的基础性理论研究给予时间、耐心和财政支持;创造条件,从国外引进创新型、复合型数字贸易人才。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右江民族医学院讲师)

加快发展数字贸易 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

加强社区治理 提升居民文化认同感

□伏秀平 吴洪锋 王静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基层单元,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搞好社区治理对于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意义重大。

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社区的精细化治理和网格化治理是技术层面的手段,而在主观层面还应进一步增进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提升其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这对于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根基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城镇化进程深化推进,人口流动性加剧,基于居住地选择的社区邻里关系逐步取代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熟人社会,陌生人社區已经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形态,传统意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基础正在逐步瓦解。因此在当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重建亟需以社区为载体,重塑自古以来的邻里守望、互助互爱的基层社会秩序力量,其中的核心要素就是在社区群众的主观认知层面,通过社区文化引领加强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共同推动社区发展,维护社区治理的成果和成效。就现实路径来看,如何加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需要从以下角度给予重视和政策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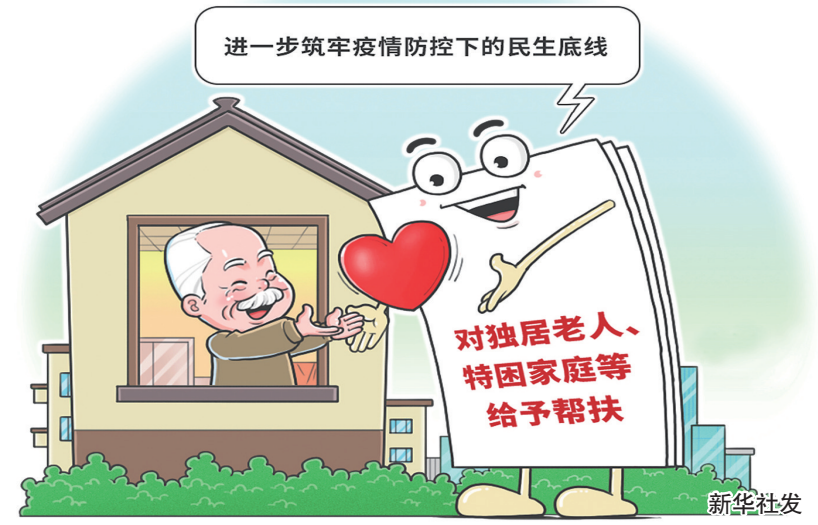
着力强化民生服务发展。文化心态是建立在基础民生需求之上的意识形态,只有先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关注群众多样化的现实需求,精准有效化解难题问题,顺应民意期望,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惠民、利民的

举措,才能真正激发出公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肯定,才能真正增强公众对于城市发展的信心和热爱。这其中包括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养老服务、基础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服务、休闲娱乐需求、治安保障、生态环境、社区公共设施等关乎群众生活质量的设施建设与服务提供。

畅通居民表达诉求和参与议事的平台和渠道。根据各类型社区特点,积极打造方便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形式多样的社区参与平台,完善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当家做主的权利行使机制,既有利于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也保证了所制定政策的民主性及科学性。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居民诉求回应机制,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夯实责任,问题前置,主动治理,快速有效回应居民诉求,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只有这样通过共同努力建成的家园,群众才会倍加珍惜,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育也会水到渠成。

开展志愿服务。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社会化的慈善服务力量,能够高度彰显出社会文明程度和社会关怀程度,能够有效弥合现代社会的 interpersonal 关系裂痕和社会服务的不足,以志愿者的爱心和责任心激发社会之中守望相助和互帮互爱的力量,改变冷漠、道德滑坡、信任缺失等现代社会的不良文明风向。因此必须加大力度发展社会志愿服务队伍,给予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社区服务建设、开展专业化群众服务、发展慈善事业、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渠道,以此来逐步提升民众的公共意识和文化认同感。

强化本土化认知。城市文明的维护和文化的延续必须依靠群众,而不



单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和工作,比如大运河文化集中体现了历史延续和生态文明的结合,是地域文化的符号,运河文化如何进一步凝聚群众热爱运河、保护运河、宣传运河的意识,是文化心态在器物层面的重要体现,并以此强化公众对于地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是社区文化认同感培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本土化的文化感召力,以加强群众对于维护社区家园和城市发展的驱动力。

文化教育持续深入。先进文化的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但当下还应认识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必须深度衔接,才能够从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认同感,带动自身家庭去贴近社会发展的秩序需求。此外,社区应是影响人的成长的重要社会化环境,因此社区教育应进一步融入学校教育之中,通过社区来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关爱意识、问题意识和

解决能力,就体现得更直观有效。

建立以党建为核心、以法治为保障的奖惩机制。公共素养的层次决定了任何一项建设必须配备有效的奖惩机制,一方面激励激发公众维护文化环境、创新文化元素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惩戒破坏文化环境的负面行为。但激励和惩罚不是毫无标准的,因此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是要在党的核心领导下,充分建立起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让奖惩办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强化责任,规范执行,严格监督,形成文明奖惩的长效机制,推动公众文化行为和思想逐步走上良性轨道。

社区治理任重而道远,同时也必将是一个系统化工程,需要在群众主观认知层面、物质保障方面、政策导向方面协同发展,方能取得切实的效果和社会效益,切实提升群众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作者单位:沧州师范学院政史系)